

论“温州模式”的特点和成因

—兼谈研究“温州模式”的方法

张仁寿

近年来，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模式的形成，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一个典型，是农村深入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深入研究“温州农村经济模式”（以下简称“温州模式”），对于促进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试图对“温州模式”的特点和成因进行系统探讨；并就研究“温州模式”的方法谈点看法。

一、“温州模式”的特点

面对农村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颇具特色的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道路，经济学界在两年之前就有人提出“温州模式”这一概念。现在，“温州模式”作为我国农村发展不同于“苏南模式”的模式而为人们普遍接受。然而，如何概括“温州模式”的基本特点，各说不一。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三种意见：（1）在经济形式上以家庭企业和联户企业为主；在产业结构上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在经营方式上企业具有自主性、经营灵活性和利益直接性。（2）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生产小商品为主，靠农民供销员和农村集市购销搞活流通渠道，靠一大批能工巧匠和贸易能手开辟致富门路。（3）在生产领域选择家庭工业，在流通领域选择专业市场，发挥群体结构优势，形成一大批专业产销基地。

“温州模式”的特点是对温州农村经济特点的理论概括和抽象，是思维对现实的反映。因此，在评论上述三种意见之前，我们必须先看看温州农村经济到底有哪些特点。

笔者认为，“温州模式”具有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即它是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有机统一。其实，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总是在特定体制下的发展，而任何一种经济体制总是在某种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从农村经济体制方面看，“温州模式”有三大特点：一是家庭经营不仅在农业部门，而且在农村第二、第三产业部门都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营方式，二是在调节手段和决策结构方面，温州农村经济不是以计划调节、实行集中决策为主，而是以市场调节、由企业和家庭分散决策为主。三是信息传输不是以纵向联系为主，而是以横向联系为主、纵横结合的网络式结构。从温州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看，目前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1）家庭工业遍地开花。1984年，温州农村家庭和联户办工业企业有13.3万户，从业人员33万人，总产值8亿元，占全市农村工业总产值的近60%，占农村工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成为温州农村经济的一大支柱。去年又有较大发展，家庭工业产值达10.5亿元。（2）第三产业迅猛崛起。1985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有功万多户，26.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12%左右，出现了经营信息、邮电、信贷、托运等的专业户。（3）产业结构趋向合理。1984年，温州农村非农业产值已超过种植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48.9%。（4）专业市场发达兴旺。到1984年底，全市农村有专业市场135个，占大小商品市场个数的37%。其中，年成交额在几千万至一亿多元的永嘉桥头钮扣、乐清柳市五金电器、虹桥农副产品、宜山再生腈纶等十大专业市场更是独树一帜，名闻遐迩，1984年成交额合计达9.55亿元。（5）各种要素市场已经形成。目前，温州农村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要素市场都已出现。如苍南宜山、金乡等地出现了为家庭工业等服务的生产资料市场；全市农村各种民间信用形式提供了近两亿元金额的借款，占农村各类企业资金需求额的30%以上，超过农行、信用社对各类企业的贷款；约有10多万雇工进入农村工业、农业（季节性）、商业和家庭服务业；技术和信息的有偿转让、有偿服务和买卖活动相当活跃，如此等等。（6）形成了一支11.7万人的农民供销员队伍，他们走南闯北，采购原料、签订合同、推销产品、传递信息。

由此观之，对“温州模式”特点的以上三种概括都没有比较全面反映温州农村经济的特点。具体说来，第一种概括把温州农村工业化模式混同于“温州模式”，因而失之偏颇。第二种概括基本上没有深入到经济有机体内部，而是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不免流于表面；何况，从直观得到的特点也远不止这些。第三种概括试图从社会再生产的总过程来揭示，在方法上是正确的。因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既包括……直接的生产过程，也包括真正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包括全部循环。”但是，

它只注意到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没有注意到产业结构和市场体系，更没有注意到经济体制方面的特点，仍然不能客观地揭示“温州模式”的特点。

我认为，“温州模式”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如下：在农村经济体制方面，家庭经营成为农村所有产业部门的主要经营方式，以市场调节为主，分散决策，信息以横向传输为主；在生产领域，家庭工业特别发达，形成以农业为基础、农村工业为支柱、第三产业同步发展、比较协调合理的农村产业结构，在流通领域，专业市场尤为兴旺，基本建立包括一般商品市场和生产资料、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的农村市场体系，从生产和流通的关系看，市场成为沟通生产与需求的桥梁，供销员成为联系生产与市场、市场与需求的中介，商品生产—供销员—市场三者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二、“温州模式”的成因

关于“温州模式”的成因，有的同志认为：一是“逼”出来的，人多地少的矛盾逼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力需要在非农业经营方面寻找出路；二是“放”出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政策放宽，允许农民务工经商办服务业；三是“干”出来的，温州农民勤劳苦干。乍看起来，这似乎把“温州模式”形成之“谜”揭开了。但深入一步考察立即令人纳闷：这三个因素在我国农村不少地区也都存在，这些“共性”为什么能形成“温州模式”这一典型（个性）呢？

笔者认为，这三个因素只是“温州模式”产生的前提条件。某一事物具备了产生的前提条件，并不意味着它必然能充分发展起来。在明确“温州模式”产生的前提条件后，还必须从地理环境与城乡经济联系、经济基础与原有体制的矛盾、传统优势与劳动力素质、政策的灵活性与干部的开拓创新精神、市场运行机制的逐步形成等方面，来系统分析和揭示“温州模式”的成因。

（一）地理环境与城乡经济联系。温州农村人均耕地不足半亩，物质资源相当稀缺；交通不便，不通火车，海运业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全境 1.17 多万平方公里，只有一个人口 36.7 万人，工业长期投资不足、基础十分薄弱的温州市，并且周围没有其他大、中城市可依托。解放初期，温州市区仅有 369 家小型私营工业企业和作坊，职工人数仅 5,000 多人，工业固定资产约为 2.8 万元；到 1983 年，市区拥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也只有 4.34 亿元。这就决定了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力弱小，城乡经济联系不多，发展规模较大的农村集体工业无所凭借而显得“先天不足”。

（二）经济基础与传统体制的矛盾。解放以来，温州农村生产力发展缓慢，集体经济的基础一直没有得到巩固；统一经营、集中管理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由于不适应温州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在振荡状态。早在 1956 年，温州农村就成为我国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的第一个实验区。三中全会以后，温州也是全国最早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地区之一。从农村工业发展历史来看，它起步不迟，萌芽于五十年代末，初步发展于六十年代初，但总的说来，1978 年前的二十年进展缓慢。近几年，允许家庭办工业的政策贯彻后，原来社队工业的相当一部分由于薄弱的经济基础与“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的尖锐矛盾而趋于分化解体，成为家庭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传统优势与劳动力素质。温州市是我国东南沿海手工业、小工业名城，漫长的历史也形成了农村比较发达、门类齐全的手工业和众多的小商小贩，这就为发展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提供了大量传统技术和能工巧匠，造就了大批善察行情、经营有方的生意人、购销员，生产经营小商品因而具有独特的优势。

（四）政策的灵活性与干部的开拓创新精神。温州农村地处僻处，“天高皇帝远”，对于发展家庭非农业经营，政策的灵活性特别强。各级领导干部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清除左的影响，大胆探索，开拓创新。他们热情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如早就允许家庭经营工商业，允许“挂户经营”，允许签订买卖合同，发业务信，对“挂户经营”企业的税收改八级累进所得税为“带征制”（即代征所得税），一些信用社早在 1980 年就开始试行浮动利率，如此等等。

（五）市场运行机制的逐步形成。温州农村家庭经营的非农业商品经济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与当地城市工业和农业的联系都不紧密。例如，1984年家庭工业为城市配套加工的产值和以当地农副产品为原料或为农村服务的产值分别都只占农村工业产值的4%左右。就是说，家庭工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层次。随着家庭工业的发展，促进家庭工业自我循环和发展的市场运行机制也逐步形成，有效地对供、产、销准行市场调节：市场体系的基本建立，进一步为发展商品生产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使生产要素根据社会需求不断得以转移和重组，农村蕴藏着的巨大生产潜能不断得以释放，出现商品生产与市场共同发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局面。

“温州模式”的形成就是上述各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研究“温州模式”的方法

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工具，认识活动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科学的灵魂”。“温州模式”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又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问题。人们对“温州模式”的研究，总的说来，当前还处在调查解剖、收集资料和描述现象阶段，主要采用典型调查方法。诚然，典型调查方法对于研究“温州模式”是必需的。但仅此还不可能对“温州模式”作出比较全面和科学的分析，必须同时采用其他一些科学研究方法。

（一）系统分析方法。自然界和社会都构成系统。系统有三个特征：集合整体性和层次性。由于“可孤立的因果系列和分离开来处理的机械论模式，已证明不足以解决理论的问题，特别是在生物社会科学之中；而且也不足以解决由现代技术提出来的实践问题”，系统分析方法就应运而生。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一种比之更好的方法。”“系统分析可被视为由定性、定量或两者相结合的方法组成的一个集合，其方法论源于科学方法论、系统论以及众多的涉及选择现象的科学分支。”系统分析必须随时注意以下几个准则：外部条件与内部条件相结合；局部效益与整体效益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系统分析方法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列宁在谈到辩证法的要素时就曾指出：“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温州模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比如它是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体制模式的统一；它的形成是由自然地理、社会历史、人力素质、经济基础、体制、政策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探讨“温州模式”的特点和成因时，原有的认识之所以显得不足与片面，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应用系统分析方法，缺乏系统观点。再比如，“温州模式”的产业结构、市场体系、生产与市场关系、运行机制、社会结构等等问题，如不进行系统分析，是不可能深刻揭示它们的特点、内在联系和变化趋势的。总之，系统分析方法是研究“温州模式”首先必须采用的方法。

（二）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是揭示现实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怎样发挥机能的；规范研究方法则回答经济应该如何发展，经济体制应该如何发挥作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过份侧重于规范性理论的创立，但由于对经济发展和运行问题缺乏实证研究，通常从某个前提性原理出发，靠演绎推理来构筑理论，提出的理想方案在现实中往往行不通，甚或不着边际。不满足于这种状况，一些经济学家如匈牙利的亚诺什·科尔内把重点首先放在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现状“解剖”上，在其名著《短缺经济学》一书中，尽管作者的宗旨是“只提供描述性解释性理论，不提供规范性理论”，但独到深刻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颇多启迪。对“温州模式”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给领导部门提供决策的依据，促进温州农村商品经济朝着正确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为我国其他农村地区经济改革与发展，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总结可供借鉴的新经验。因此，既要描述和揭示实际状况，又要作出价值判断和趋势推测，这就要求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规范性理论认识，把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结合起来。比如，对温州农村市场体系的认识，必须先描述、分析实际情况，揭示其产生的必然性，然后对其作用、意义和发展趋势进行评价与推测。概言之，舍实证研究而取规范研究，或者舍规范研究而单纯求实证研究，都是不利于全面认识“温州模式”的。正确的做法是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恩格斯指出：“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

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就是说，必须采用逻辑方式即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才能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但逻辑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逻辑与历史密不可分，必须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来抽象经济理论，把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温州模式”中有特色的经济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历史发展过程和内在的逻辑联系。比如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在农业部门的实施—人地矛盾随华产率提高的激化—家庭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专业市场的勃兴—要素市场的出现，产业结构的变革等等，它们之间就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合乎逻辑的思维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尽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对它们相互关系和总体结构的把握。

（四）比较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对不同理论、不同经济制度和体制、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模式都可以而且应该进行横向或纵向的比较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晰地认识“温州模式”。比如，“温州模式”的特点就是与我国其他农村地区进行比较后而得到的认识。必须注意，研究“温州模式”

必须把上述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加以运用。“温州模式”具有丰富的内容，“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这就告诫我们，掌握科学的方法还只是保证研究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只有经过艰苦的探索和辛勤的劳动之后，才有希望比较全面和科学地认识“温州模式”。这也是我们努力要达到的目标。

1986年2月稿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